



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 历史名人

吴争春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吴争春 著

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 历史名人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历史名人 / 吴争春著.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 - 7 - 5648 - 1170 - 9

I. ①中… II. ①吴… III. ①中外关系—文化交流—文化史②历史人物—生平事迹—世界 IV. ①G125②K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84652 号

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历史名人

吴争春 著

◇责任编辑: 刘苏华

◇责任校对: 蒋旭东

◇出版发行: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410081

电话/0731. 88853867 88872751 传真/0731. 88872636

网址/http: //press. hunnu. edu. cn

◇经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 长沙宇航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 mm × 1000 mm 1/16

◇印张: 15

◇字数: 215 千字

◇版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648 - 1170 - 9

◇定价: 30. 80 元

目 录

绪 论	(1)
一、外来文化与中国	(1)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	(24)
第一章 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徐福	(32)
一、徐福东渡的文献记载	(34)
二、徐福东渡的传说与史迹	(40)
三、徐福的传说与早期中日文化交流	(43)
第二章 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张骞	(48)
一、张骞出使西域的起因	(49)
二、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的经过	(52)
三、张骞通西域与汉代中西文化交流	(56)
第三章 佛典汉译之泰斗——鸠摩罗什	(63)
一、鸠摩罗什的生平	(65)
二、鸠摩罗什在佛教文化东传史上的贡献	(73)
第四章 中国第一留学僧——玄奘	(80)
一、玄奘西行求经的动机	(81)
二、玄奘西行求经之路	(84)
三、玄奘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与贡献	(93)
第五章 传播大唐文化的使者——鉴真	(99)
一、鉴真东渡日本的传奇经历	(100)
二、鉴真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	(111)
第六章 “欧洲第一使者”——马可·波罗	(119)
一、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	(120)

2 | 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历史名人

二、马可·波罗的东方之行	(125)
三、马可·波罗与中西文化交流	(129)
第七章 七下西洋的伟大航海家——郑和	(135)
一、郑和出使西洋的目的	(136)
二、郑和七下西洋	(139)
三、郑和下西洋与中外文化交流	(144)
第八章 “泰西儒士”——利玛窦	(151)
一、利玛窦在中国的传教经历	(152)
二、利玛窦与西学东渐	(158)
三、利玛窦与中学西渐	(164)
第九章 “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严复	(167)
一、严复生平	(168)
二、严复与近代西学在中国的传播	(175)
三、严复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与贡献	(183)
第十章 国人英译儒经的先驱——辜鸿铭	(186)
一、辜鸿铭生平	(187)
二、辜鸿铭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	(196)
第十一章 “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	(213)
一、容闳的早期教育经历	(214)
二、容闳与清末幼童留美运动	(217)
三、容闳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与贡献	(225)
参考文献	(229)
后记	(235)

绪论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儿女在创造和传播中华文明的同时，也不断从其他文明中汲取营养，并加以消化利用，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历史上中华文明的输出曾为东亚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对异域文化的借鉴和吸收也曾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中外文化交流始终是推动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不断进步的强大动力。

一、外来文化与中国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讲道：“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① 概括地讲，影响中国最大的外来文化，一是佛教，二是明清以来的西学。俄国文化、美国文化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给中国文化以重要影响，但是，这些外来文化都没有影响到中国文化本体的根本改变，中国人从来都是以外来文化服务于中国的本体文化，以实现自我的再生和创新，所以才能成为世界文化大家族中的一朵奇葩。

（一）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既深且巨。中国佛教是印度佛教与中国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

社会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印度佛教的新发展。佛教在中国流传过程中，通过自身文化的优势和特点，呈现出对中国文化的强大渗透力，并对汉以来整个中国文化产生了极其广泛和深刻的影响，进而使自身融入中国各类具体文化形态之中，充实与丰富了中国文化。如果把中国古代文化具体化为诸如哲学、文学、艺术等，那么，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就显而易见了。

1. 佛教与哲学

著名国学研究专家赵朴初先生曾指出：“佛教哲学蕴藏着极深的智慧，它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称誉佛教处在人类辩证思维的较高发展阶段上。在世界观上，佛教否认有至高无上的神，认为事物处在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因果网络之中。在人生观上，佛教强调主体的自觉，并把一己的解脱与拯救人类联系起来。佛学与中国古典哲学的交互影响，推动了哲学提出新的命题和新的方法。它以独特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给予人们以新的启发，使人们得以解放思想，摆脱儒学教条的束缚，把人的精神生活推向另一个新的世界。”^①

佛教价值观念的主要内容是人生解脱论。佛教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由多种原因和条件构成，并处于不断变化、流动的过程中。人生也是如此。人有生老病死的自然变化，有对自由、幸福、永恒的强烈追求，有从自我出发的无穷欲念。由于与不断变化的客观现实相矛盾、相冲突而不能得到满足，因此人生是痛苦的。中国僧人说，人的脸形就是“苦”字形，是一副苦相：眼眉是草字头，两眼和鼻子合成十字，嘴即“口”字。佛教还认为，人要根据生前的行为、表现，死后转生为相应的生命体，这叫做“生死轮回”，轮回是无休止的。这样人就陷于不断的生死轮回的痛苦深渊中。佛教认为，人的理想、目标是解除痛苦，超脱生死轮回，就是“解脱”。解脱的境

^① 赵朴初：《赵朴初谈中国佛教的过去和现在》，佛缘网站 <http://www.foyan.net/article-103406-1.html>。

界称为“涅槃”。“涅槃”梵语原意为“火的熄灭”。“涅槃”作为佛教所追求的一种解脱境界，是通过佛教修持，熄灭、超越一切欲念、烦恼、痛苦和生死轮回而达到的理想境界。人生现实是痛苦的，这是现实性，人生理想是“涅槃”，这是超越性。人生活在现实社会中，又要超越现实生活求得解脱，就是要由现实性转化为超越性，从而达到更高的主体性——理想人格。

佛教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其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佛教哲学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哲学，并与中国固有哲学合流，成为古代传统哲学的一部分。佛教哲学的影响，表现在人生论上，提出人生价值是痛苦，人生本质是空的命题，并以因果报应说为支配人生的铁的法则，成为了对儒、道人生哲学的补充。在心性论上，南北朝、尤其是隋唐时代的佛教多讲心性之学，对于人的本性、欲望、烦恼等的性质和转换问题，作了细致的阐发，极大地影响了唐以来中国哲学的方向，也是佛教对古代哲学的最大发展。在宇宙论上，佛教不仅提出现象和本质皆空的学说，还着重阐发了以个人的意识和共同的“真心”为本体的学说，丰富了中国古代唯心主义本体论。中国传统的宇宙观是天圆地方，佛教的宇宙观是大千世界，佛教认为日月普照的是一个小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小千世界合为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才形成一个大千世界。佛教的宇宙观丰富了中国对宇宙的理解与想象。在认识论上，佛教以其神秘直觉思维方式、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学说，以及强调主体、自我意识和主观能动性的学说，丰富了中国古代的认识论，并在伦理道德和文学艺术领域发生了深刻影响。

此外，佛教对玄学和理学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和学说取向也产生过深刻的影响。魏晋玄学家探讨有无、言意和动静等问题，各执一端，相持不下。佛教学者僧肇著文，阐述非有非无、不知即知、动静相即的观点，客观上对玄学的基本问题作了总结，把玄学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佛教对于理学的影响，是大家公认的，应当说这种影响是全面、深刻的。从学术的角度来看，主要是隋唐佛教大讲心性之学，大谈修持方法，对儒道造成了强烈的刺激，推动了

儒学形态诸方面的变化：

第一，促进了儒学要典的确定。一些涉及心性修养问题的典籍《孟子》、《大学》和《中庸》被表彰出来，与《论语》相配合，合称《四书》，作为儒学要典，以与佛教相抗衡，并长期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科举取士的初级标准书。

第二，推动了儒学学术旨趣的转移。宋明新儒学——理学和以往儒学风格不同，不是侧重社会政治伦理、少言性命之学，而是重视修身养性的性命之学。

第三，影响理学思维方式的转换。佛教心性学说着重讲人的本性与欲念对立，本性清净、觉悟，欲念污染、迷惑，应当去掉情欲妄念，恢复本性。这种本性与欲念对立的思维方式为理学家所吸取，转化为天理与人欲对立的观念，“存天理，灭人欲”成为理学家的核心思想。

第四，促使理学修养方法的确立。佛教的止观学说，直指本心观念，即观心、禅定的方法，也为理学家所效仿，形成了主静、主敬的修养方法。禅宗与理学是唐宋时代儒、道、佛三教融合而成的两大思想文化成果。

2. 佛教与伦理道德

佛教伦理道德与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等级制度和儒家纲常名教存在着严重的对立。儒家学者从维护儒家礼仪和中国传统习俗的立场出发，指责佛教僧侣的剃发出家、不结婚生子、见人君无跪起之礼、施舍家庭财产等，是不孝、不忠、不仁、不义的表现，佛教对此一直采取调和的立场，以协调两者的关系。

中国佛教通过比附融合、撰文论证以及确定有关宗教仪式，突出宣扬忠孝等儒家观念。如宋代名僧契嵩说：“夫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言，信也。”把佛教的“五戒”比作儒家的“五常”。契嵩又大力阐扬孝道，称：“夫教，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至哉大矣，孝之为道也夫！”强调孝是天经地义的大道。契嵩还崇扬中庸之道，说：“中庸之道也，静与天地同其理，动与四时合其运。”中庸与天地同理，与四时

合运，是宇宙的真理与法则。佛教传入中国以后，随着因果报应、业报轮回思想的深入人心，为父母追荐冥福，请诵经作法事的僧侣担当孝道使者的活动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凡此，对于孝道观念的强化，积淀为社会心理，都起了重要作用。

佛教的基本道德标准是去恶从善、慈悲平等、利人利己，这些观念不仅充实了中国的伦理道德学说，而且也发挥了稳定社会的作用。在近代，佛教伦理道德还曾为一批先进人物如魏源、龚自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章太炎等，作为改造社会道德乃至改造社会的工具，它显示出的积极作用是不容否认的。在当代，佛教的大乘戒行、无我利人的精神、去恶从善的德行，以及人间净土的行愿等，都是能与现实社会相协调，并有助于推动社会发展的。

3. 佛教与文学

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全面的、长期的，给中国文学带来了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巨大推动和变化。佛教典籍中如《维摩经》、《法华经》、《楞严经》和《百喻经》等，本身也是瑰丽多彩的文学作品，向为文人所喜爱。又如《本生经》是叙述佛陀生前的传记文学，《佛所行赞》是长篇叙事诗。这些佛典的译出，不仅创造了融冶华梵的新体裁——翻译文学，而且为中国文学的创作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和新的命意遣词的方法。佛教典籍鼓舞了中国晋、唐小说的创作，并为后来的古典小说如《西游记》、《三国演义》、《金瓶梅词话》和《红楼梦》等的创作提供了故事情节和思想内容。例如，《红楼梦》里的《好了歌》就体现了佛教四大皆空的思想。在佛教看来，尘世间的一切皆空，只有人的精神和灵魂是真实的。人生在世，或为名所累，或为利所困，或为情所伤，或兼而有之。人们在红尘世界中的种种追求欲望不但缥缈缈缈、虚幻莫测，而且让人陷入苦海之中而难以自拔。解脱尘世烦恼的唯一办法就是摒弃世俗的欲望，弃绝尘世的追求，回到空灵。佛教的俗讲、变文，直接推动了后来的平话、宝卷、弹词、鼓词、戏曲等通俗文学艺术的形成，佛教禅宗语录也对后来的民间文学作品发生影响。

佛教不仅对我国古代文学产生过重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

到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如佛教的“言语道断”说、“顿悟”说、“妙”与“现量”说、“境界”说，以及“以禅喻诗”，用禅宗的一套禅理来论述诗的创作、欣赏和评论，就是这方面的突出表现。可以说，没有佛教的影响，中国汉代以后的古代文学将是另一番面貌。

4. 佛教与语言

印度声明学（训诂和词汇学）影响汉语体系的发展，因明学（认识论和逻辑学）则影响到逻辑思维的发展。佛教文化是汉语文化源之一，它推动了汉语语言方法论的变化。汉字是以音节为单位的象形文字、表意文字，南朝时人在佛教梵声的影响下，把字音的声调高低分为平、上、去、入四声，用于诗的格律，推动了音韵学的前进和律体诗的产生。在注音方式上，东汉以来盛行为直音改用反切，这也可能与受梵文拼音的影响有关。至于在唐末僧人守温制定三十个字母的基础上，在宋代形成了“三十六个字母”——汉语语音的三十六个声母，和分析汉语发音原理及发音方法的学科“音韵学”，更是梵语语音体系汉语化的产物。还有佛教音义之书，由于保存了大量久已失传的古代字韵和其他文史典籍，又为古籍的辑佚、校勘、训诂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在语法学方面，佛教对汉语的句法结构产生了潜在的影响，如佛教著作判断句用“是”来承接主宾语，句末不再用“矣”、“焉”、“也”、“耳”等语气词。佛教还为中国文学语言宝库增添了新的词汇。佛教成语占中国汉语外来成语的9/10。而且许多佛教用语逐渐演化成日常用语，如世界、实际、方便、平等、知识、相对、绝对等等。至于出现姓氏、人名、地名的佛教化，更反映出佛教对汉民族心理和文化意识的深入渗透。

5. 佛教与艺术

艺术是佛教与中国文化关系最密切的领域之一。宗教与艺术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情感体验和表现手法等方面是相似、相近和相通的。宗教需要通过自身的审美潜在力的艺术展示来显现自身的存在，佛教也需要艺术，没有艺术活动它就不能存在。汉魏以来，佛教在建筑、美术和音乐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使中国艺术

大放异彩，进入崭新的阶段。

佛教建筑主要是寺塔，这是随佛教的传入而发展起来的。最古老的石窟寺，其中举世闻名的如敦煌、云岗、龙门三大石窟，都是根据印度佛教造型艺术，糅合中国民族形式建造的。又以今天汉族地区 124 座全国佛教重点寺院来说，如洛阳白马寺，登封少林寺，南岳福严寺、南台寺，广州光孝寺，韶关南华寺，苏州寒山寺，扬州大明寺，泉州开元寺等等，都是建筑各有特色的上千年历史的名刹古寺，五台山的南禅寺、佛光寺是至今保存完整的古代木结构寺院，寺内彩塑精美绝伦。中国的佛塔建筑大约起源于三国时代，除了印度式的，多为中国式样，采取中国原有阁楼形式，建成可供凭眺的楼阁式建筑。藏传佛教的寺庙，一般都有庞大的建筑群，体现了藏族古建筑艺术的特色和汉藏文化事例的风格。

佛教美术主要是绘画、雕塑，也是随佛教的传入而发展为具有中国民族的风格和特色。早在梁代，以善画佛像名世的张僧繇，是佛画中国化的开创者和推动者，创立了笔法简练的“张家样”，在南北朝后期影响很大。北齐佛画家曹仲达创立了“曹家样”，其特点是衣服紧窄，与印度笈多王朝的雕刻风格相近。唐代吴道子创立的“吴家样”，其特点是衣带宽博，飘飘欲仙，突出了浓重的中国风格。佛教的壁画也很著名，敦煌莫高窟和麦积山石窟都保存有壁画，敦煌 570 个洞窟中至今保存的壁画约近六万平方米，这些作品色彩艳丽，辉煌灿烂，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佛教音乐也是佛教艺术的重要方面。佛教认为，音乐有“供养”、“颂佛”作用，在举行宗教仪式时都要用音乐——声乐和器乐。佛教音乐传入中国内地称为梵呗。由于汉梵语音不同，曲调难以通用，约在三国时佛教音乐就“改梵为秦”，用中国的音调来配唱经文，形成了中国佛教音乐。中国地域辽阔，佛教音乐在创作过程中，由于各地方言、地方民间音乐和风俗习惯的差异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独特风格。在唐代进入鼎盛时期，佛教音乐家辈出，在创作、演唱、演奏上都达到了很高水平。佛教音乐对中国民间说唱音乐、声韵学、乐律、音阶、音型、音调和字谱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

影响。

6. 佛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属于不同领域，佛教与自然科学有其对立的一面，也有其统一的一面。佛教徒的物质生活、宗教实践和宗教宣传，使佛教在医学、天文和印刷术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佛教与医学的联系不是偶然的，佛教的寺庙多集中在远离都市的山区，寺庙僧人形成相对独立的社会实体，需要有法师兼任医生专门医治疾病。佛教讲乐善好施、普度众生，济世治病也是寺院的一大功能。

中国佛教寺院有的设专科，有诊堂、药室，为患者治病。如浙江萧山竹林寺女科，历史悠久，遐迩闻名，一度门庭若市。唐代寺院立的福田院或悲田院，就是养病院。宋代政府的安济坊（救济机关）置官医，也往往请僧人担任。现在有的藏传佛教寺庙还设有专门学习医学的经学院。我国敦煌石窟壁画和藏经洞遗书中，保存了大量的医学史料，遗书中有近百件医药文书。其中有已知的反映我国最早的一幅有关口腔卫生的绘画，还有不少久已失传或书目上未见记载的医书，都是弥足珍贵的。唐代名僧鉴真，也是一位名医，相传著有《鉴真上人秘方》，他将中国的医药以及建筑、雕塑介绍到日本，增进了古代中日文化交流。

佛教与天文学的联系也不是偶然的，人类的生产和生活都与季节变化密切相关，而季节变化和天象直接相联，所以古代都重视对日、月、星等天体现象的观察。由此各国也都流行占星术，以观察星辰运行、人事祸福。还依据天象编制历法作为计算年、月、日的时间系统。唐高僧一行，也是精通历法和天文的天文学家。他与人同制黄道游仪，用以测定恒星的位置和研究月球的运动。又与人根据实测，在世界上第一次测量出子午线一度的长度。他还编订《大衍历》，这是一部当时先进的历法，施行了29年，并对后来历法家编制历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敦煌遗书中保存着两幅星图，其中一幅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一种，还有历日、天文图等文献资料和绘图，对于研究古代天文学史具有重要的价值。

印刷术被称为“文明之母”，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都为我国首创。佛教不仅推动了印刷术的进步，而且它保存的大量古代印刷品，为研究印刷术的演变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例证。例如现存世界上第一部标有年代的雕版印刷品，就是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王介为父母祈福所刻的《金刚经》，经卷完整无缺，雕刻精美，印刷清晰，表明绝非雕版印刷初期的印本。自宋太祖最初雕印大藏经而后一千年，先后有二十余次刻本，完整地体现了宋以来印刷术的发展历程。

佛教对造纸也是有贡献的。有的寺院植楮树，取皮，浸以香料水，制造经纸，用以抄写佛经。如唐代法藏在《华严经传记》卷五《书写》中就有僧人造纸的明确记载。

7. 佛教与道教

道教为了宣传教义与佛教争高下，大量仿照佛经编造道教的经典。如《洞玄灵宝太上真人问疾经》就源于《法华经》，《太上灵宝元阳妙经》是据《涅槃经》改编而成，《太玄真一本际经》是深受《般若经》空论影响的产物。在《道藏》中还有一些题属佛教的著作，如《昙鸾法师服气法》、《达摩大师住世留形内真妙用诀》等，也包含了鲜明的佛教内容。一些著名道士改革道教、推动道教的发展，其内容之一就是吸收佛教思想和方法。例如北魏著名道士寇谦之，改革天师道，主张六道轮回就是引佛入道，还模仿佛教礼节和修行方式，提倡立坛宇、积累功德、持戒修行、诵经成仙等等。南朝齐梁时著名道士陶弘景，开道教茅山宗，是南朝道教上清派的代表人物。他主张佛道双收，亲受佛戒，建佛、道二堂，轮番朝礼。金初王重阳创立的全真道，主张三教合一，以《道德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孝经》为主要经典。他还学习佛教的规定，创立道教的出家受戒制度；又学习佛教的参禅，止观法门，发展内丹修炼，不搞外丹。如果说，宋明理学是儒道佛融合的产物，那么道教全真派虽也受儒家思想影响，但主要是道佛融合的产物。全真道在北方影响颇大。

8. 佛教与民间宗教

佛教对民间宗教的影响极为深远，可以说宋以来的重要民间宗

教几乎都与佛教有关。民间宗教中最大的教派白莲教就渊源于佛教净土宗，并混合明教等教义而成。南宋僧人慈昭（茅子元）在流行的净土结社的基础上创立新教门，称白莲宗，即白莲教。此教也崇奉阿弥陀佛，以往西方极乐世界为目标。师徒传授，宗门相属，并形成了一大批有家室的职业教徒，称白莲道人。白莲教一度被视为“事魔邪党”，后在元代势力极盛，随之又发生分化，以致宗派林立，迄至清代，白莲教的支派竟多达百余种。白莲教的重要支派有大乘教、黄天教、龙天教和无为教（罗祖教、罗教）等。白莲教各派的成分复杂，有的攀附上层、取悦朝廷，有的与下层群众结合，发动武装起义反对朝廷。自宋至清，不仅影响了民间信仰，而且在社会生活中也发生了重大的作用。

9. 佛教与民间习俗

佛教的传入和佛教徒的生活带给中国民间习俗的影响是十分广泛和深远的。首先在饮食文化方面，印度佛教戒律规定僧尼不准吃荤，不是指禁食肉食，而是指禁食葱、蒜等气味浓烈的刺激性较强的食物。南朝佛教信徒梁武帝萧衍根据佛教禁戒杀生和《大般涅槃经》等的教义，提倡茹素，并在汉族僧尼中普遍实行。这种素食制度推动蔬菜、水果和食用菌的栽培和加工，包括豆制品、面筋制品业和制糖业的发展，并形成了净素烹饪流派。素食对人民的饮食结构和身体健康影响极大。

由于坐禅养神的需要，寺院饮茶成风。种茶、制茶、品茶、饮茶是山寺僧人的重要生活内容。名山、名茶、名利几乎是三位一体。寺院的饮茶风气，极大地促进了民间饮茶习俗的普及。

此外，佛教以农历十二月初八为佛祖释迦牟尼的成道日，自宋代开始，佛寺于是日供应腊八粥。这是民间腊八节喝腊八粥习俗的由来。其次，在节日文化方面，民间元宵灯节就从佛教法会演变而来。佛教视火光为佛陀的神威，谓灯火的照耀，能现佛陀的光明，象征佛陀的智能，破人世的黑暗，摧众生的烦恼。所以灯是佛像、菩萨像前的供具之一。据传，佛祖释迦牟尼示现神变、降伏神魔是在东土正月十五日。为纪念佛祖神变，是日举行燃灯法会，以表佛

法大明。在佛教法会的影响下，从唐代起，元宵张灯渐成民间习俗。又，汉地佛教每逢农历七月十五日举行盂兰盆会，以超度先灵，后演成民间的中元节，届时以各种形式祭奉祖先。还有佛教纪念佛、菩萨的誕生日、成道日，也演化为庙会 and 民间信仰节日。如按照佛教传说，农历二月十九日是观音菩萨誕生日，汉族、满族地区普遍举行盛大的观音庙会，十分热闹。至于藏族和傣族地区，佛教节日和民间节日更是融为一体了。

再次，在葬仪方面，人死后不仅要请和尚诵经祈福，超度亡灵，而且宋元时代火葬习俗的流行也受佛教葬仪的影响。相传释迦牟尼逝世后实行火葬，其舍利安置在塔中。佛教沿袭这种做法，僧尼逝世后一般都实行火葬，中国汉地佛教也是如此，中国火葬起源很早，但火葬的流行是受佛教的影响，时至今日，也有在家佛教徒死后送到佛寺火葬和安置骨灰的。

10. 佛教与社会心理

社会心理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潜意识，是不见文字著作表述的内在观念。佛教对中国社会心理所造成的最大影响是报应观念。佛教宣传因果报应理论，强调“未作业不起，已作业不失”，人们的现实社会地位和各种遭遇都是自身前世作善恶业的结果，今世所作的业将决定来世的命运。这种理论和中国固有的报应观念相融合，长期积淀在人们的心理，形成了深沉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观念，为约束自身的言行，奉行去恶从善的道德准则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此外，佛教提倡忍辱以求得好报，带来了容忍、宽容、忍辱、忍受、忍让的心理影响。佛教讲普度众生、布施，也生发出同情心理、助人精神，而这些心态和精神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是有积极作用的。

(二) 西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1. 西学传入中国的两个阶段

所谓“西学”，简单地说就是欧洲近代资产阶级的新文化。西学传入中国，开端于明朝万历年间，即16世纪中叶，至今仍在进行

中。从明末清初西学与中国发生联系以来，西学东渐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明末清初至1840年鸦片战争前，是西学与中国文化初步接触的阶段；鸦片战争之后的150年间，则是中西文化广泛而深入的全面交汇阶段。

第一个阶段 明万历年间，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对中国的学术思想有所触动。此时的西方科学技术正开始迅速发展，而中国这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非常缓慢，大大落后于同时期的欧洲。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教义的同时，也传入大量科学技术。当时中国一些士大夫及皇帝接受了科学技术知识，但是在思想上基本没有受到影响。这一阶段的西学东渐，由于雍正的禁教，加上罗马梵蒂冈对华传教政策的改变而中断，但较小规模的西学传入并未完全中止。此时的西学传入，主要以传教士和一些中国人对西方科学著作的翻译为主。1605年利玛窦辑著《乾坤体义》，被《四库全书》编纂者称为“西学传入中国之始”。当时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在天文学、数学和地图学方面，由于只在少数的士大夫阶层中流传，而且大部分深藏宫禁，没有能够很好地普及。

第二个阶段 19世纪中叶前后开始，西方人再度进入中国，并以各种媒介带来西方的新知识。由于鸦片战争中国失败，当时的先进分子认为天朝上国失败的原因是由于洋人的坚船利炮，因此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清朝政府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推行洋务运动，也促使西方的科学技术再一次传入中国。当时的洋务人士，主要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来面对西学，主要关注的是西方的先进武器以及相关的器械运输等，而未试图对西方的学术思想加以学习，因此在这期间学术思想方面的传入主要借由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媒体，以及洋务机构中为军事目的顺道译介的书籍。甲午战争以后，由于中国当时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命运，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的失败表面上是科学技术的失败，实际上是整个学术体系和政治体制不行。于是出现了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一批思想家。他们向西方学习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政治上也要求改革。这一时期大量的西方知识传入中国，影响非常广泛。许多人